

探索国际关系中的 政治经济互动机制

樊勇明

【内容提要】 探索国际关系中的政治与经济互动机制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历史使命。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与经济相互关系的基本观点的同时,还必须从西方学术界汲取营养。以基欧汉和奈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相互依存理论、以吉尔平为代表的新现实主义霸权稳定论以及以多斯桑托斯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依附论,分别从不同角度对国际关系中政治与经济互动的具体表现形式及其路径、机制提出了较有说服力的理论假设。这些都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借鉴。

【关键词】 国际关系;政治经济;互动机制

【作者简介】 樊勇明,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邮编:200433)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9550(2005)03-0037-07

国际政治经济学是 20 世纪 60~70 年代在国际学术界兴起的一门新学科。从理论体系来看,国际政治经济学是国际关系理论家族的一个分支,其使命是探索国际关系中的政治与经济互动机制。换言之,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任务是:在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框架中,完整、清晰地描绘出国际关系中政治与经济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形式、途径及其一般规律。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曾直言不讳地解释了美国中东政策的奥秘:美国的中东外交是为“美国的利益”服务的,如何服务?她一语道破天机:就是保证不再出现 1973 年中东战争期间美国人排队抢购石油的状况。^①这是政治家对国际关系中政治经济互动机制的直观而通俗的解释。对于学者来说,问题远非如此简单。国际关系理论工作者的任务是用理性和哲理去分析纷杂的国际现象,从中找出政治与经济相互作用的机制,使之上升为理论,从而使人们能运用理论工具对整个世界的走向做出科学的预见和判断。

一 国际政治经济 互动研究的指导思想

对于政治与经济的相互关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有精辟的论述。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3 年德文版的序言中写道,“每一个历史时代的经济本质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和精神的历史基础”。^②简而言之,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对经济基础具有强烈的反作用。

不少学者把上述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与经济相互关系的基本原理成功地运用于国际关系研究中。他们认为,“在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的相互关系上,也首先

^① 刘小林主编:《冷战后国际关系理论的变化与发展》,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第 215 页。

^② 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83 年德文版序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年版,第 233 页。

表现为国际经济是国际政治的基础,国际经济对国际政治有着决定性的作用”^① 尽管经济决定政治,但是政治不是被动地接受经济的影响和作用,而是能动地反映经济并反作用于经济。有时这种反作用甚至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这一对关系中,也同样反映了这种现实。^② 他们强调说,由于国际政治关系和国际经济关系的实质是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是由国家的统治阶级通过其对外政策和对外行为来决定的。因此“政治因素在国际范围内的地位与作用就表现得更重要,国际政治对国际经济的影响也就表现得更为明显”。^③

遵循这一基本思路,他们详细地分析了国际经济决定国际政治的形式和途径以及国际政治对国际经济的反作用的形式和途径。

国际经济影响国际政治的表现形式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国际经济格局是国际政治格局形成的前提和条件。第二,国际政治格局的发展方向与国际经济格局的演进方向基本一致。第三,国际政治力量实际上是一种综合国力,国家经济实力是构成一国综合国力的基础。

关于国际经济决定国际政治的途径和机制也包含三个层次:一是经济利益是国家对外目标的核心;二是经济实力是综合国力最核心的内容;三是国际经济关系具有强烈的政治性。

学者们对国际政治反作用于国际经济的形式、途径和机制也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国际政治对国际经济的反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国际政治体系中各种政治力量的斗争对世界经济体系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例如,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是建立在帝国主义和强权政治上的。第二,体现在国际政治格局中的基本特征对世界经济体系的类型有着重要影响。例如,冷战时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个独立的经济体系和两个平行的市场就是东西方政治对立的产物。第三,国际政治体系一经形成,对主要力量(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具有强大的制约作用。

至于国际政治反作用于国际经济的途径和机制,学者们的主要看法可归纳为:第一,国际经济关系的实质是一种政治关系。第二,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和对外经济活动只不过是实现国家对外政治目标的手段。第三,意识形态对国家间经济关系有制约作用。第四,

军事因素也影响国家间经济关系。

这部分学者还认为,国内政治经济和国际政治经济是相互独立的,均有自身的运动和发展规律,但两者并非相互隔绝,而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因此,他们在研究各个国际行为主体相互之间的政治经济互动的同时,十分关注每一个国际行为主体内部政治经济与外部政治经济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④

毋庸置疑,上述研究反映了学者们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政治经济相互关系原理的深刻把握和初步运用,反映了国际关系中政治经济互动研究已引起学者们的广泛关注与重视。由于当前国际政治格局和国际经济关系出现了新特点、新内涵,国际政治经济学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如何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借鉴西方国际关系相关研究成果,使政治经济互动关系研究在上述论述基础上得到进一步拓展。

马克思主义的灵魂是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一系列基本原则只有同各个领域里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具体现实结合起来才会显示活力,并成为改造世界的力量。经济是基础,它决定着政治形态;政治是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这是马克思一再阐述的基本原理。但是马克思对这条基本原理的阐述是十分生动而具体的。正因为他首先发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剩余价值,因而才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不可避免的科学论断。换言之,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相互关系的理论是通过经济领域里剩余价值的客观存在和政治领域中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性来体现的。因此,人们信服地认为马克思关于政治与经济相互关系的论断是科学的学说,它正确地描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政治与经济的内在因果关系,预测了经济剥削必然引起政治革命的历史趋势。

反观上述关于国际关系中政治与经济相互关系的论述,这些学者在对相关术语的解释和再定义上,在相关概念之间的归纳和推演上确实是成功的、有创意的。当然,从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发展的角度来看,我们还需要更具针对性的阐述,以在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之间架起一座互通的桥梁。

① 宋新宁、陈岳:《国际政治经济学概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1页。

② 宋新宁、陈岳:《国际政治经济学概论》,第67页。

③ 宋新宁、陈岳:《国际政治经济学概论》,第67~68页。

④ 宋新宁、陈岳:《国际政治经济学概论》,第55~73页。

二 认识国际关系中政治经济互动的特殊性

理论总是在积累和继承中发展的。如果没有对前人学术成果的批判性继承,当代理论就很难向前发展,科学创新就缺乏基本前提和条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坚信自己创立的理论是十分正确的同时,也坚决否认自己发现了终极真理,更不主张后人“除了袖手一旁惊愕地望着这个已经获得的绝对真理出神,就再也无事可做”。马克思主义也需要发展、需要完善。

诚然,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史表明,对于政治经济相互关系的论述从未因马克思和恩格斯去世而停滞,许多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从不同角度丰富和发展这些观点和学说。特别是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以下简称《帝国主义论》)这本经典著作中对政治经济互动关系进行了科学而深刻的阐述。

众所周知,马克思创立的政治经济学主要是关于资本主义一国之内的政治经济学,是对单独资本主义国家形态及其变化趋势的分析。是列宁首次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政治与经济相互关系的学说运用到国际关系上来。他的《帝国主义论》分析和解释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相互关系和帝国主义与战争的必然联系。列宁从生产集中引起垄断和金融寡头统治的经济现象出发,论述了资本输出的必要性和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导致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为瓜分和再瓜分殖民地而不可避免地爆发战争的政治后果。

列宁把资本输出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挂起钩来,科学地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原因,从而为处在帝国主义战争中的俄国无产阶级指明了前进的方向,直接指导了俄国十月革命。尽管十月革命建立的苏联已经不复存在,但是《帝国主义论》把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决定政治上层建筑、政治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论断创造性地运用于国际关系中的巨大理论创新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代表人物之一罗伯特·吉尔平中肯地评价到:“列宁其实已经根本上将马克思主义从一种国内经济理论改变为一种阐述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国际政治关系的理论。”^①

从上述马克思和列宁在不同时代对于政治经济相互关系的分析,可以得到的结论是:马克思的灵魂是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其理论体系是与时俱进

的。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抓住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从资本输出入手,解释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因。列宁的这一理论著作提出了严肃的学术命题,即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解决现实问题。是对词句做机械性和扩大性的解释,还是从理论上去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国际政治经济学面临的真正挑战。

如果换个角度,从国际关系理论建构角度来看问题,也可得出与上述同样的结论。

众所周知,国际关系研究缺乏理论。马丁·怀特在1966年发表的《为什么不存在国际理论》一文中直言不讳地指出,国际关系研究者尚没有出现“经久不衰的、自成一体的、反映整个学科观念发展历程的伟大作品”。^② 国际关系研究中大量使用的概念、原理基本上来自于政治学,国际关系理论只是政治学在国际层面的运用。但是这种运用并不是生搬硬套。霍布斯关于国际社会是丛林社会的论述、摩根索关于国际政治权力的论述等等无一不闪烁着其独特的智慧之光。他们的这些论断之所以被国际关系研究人员奉为圭臬,是因为这些论述是通过对众多国际政治现象的考察而建立起来的有说服力的学说体系。

日本学者星野昭吉曾有专著论述国际关系理论的构建。他认为,理论的有效性具有三个衡量基准:第一是对现实的正确论述。第二是对现实的恰当说明,即因果分析。第三是对现实的具有可信性的预测。按照这三条标准,依照理论所能解释的层次和范围,可以把理论分为个别理论、中层理论和一般理论。按他的说法,只能解释和预测社会现实局部的理论只好算是个别(部分)理论;如果分析和预测范围从局部上升到较广泛的领域,即可以称之为中层理论;只有对整个领域做出解释和预测的才能算是一般理论。同马丁·怀特一样,星野昭吉认为,迄今为止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一般理论尚未形成,充其量不过是一种中层理论,他写道:“能够包容并理解国际政治全部现实体系的描述、说明、预测、规范和对策,并且具有始终如一的自我修正

① [美]罗伯特·吉尔平著,杨宇光等译:《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8页。

② Martin Wight, "Why Is There No International Theory?" In H. Butterfield and Martin Wight, eds., *Diplomatic Investigations*,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66, pp. 17-34.

能力的知识体系尚未问世。”^①他指出,在国际关系理论领域发展的现阶段,“最可行的研究策略是首先建设与各种分析相关的中层命题之岛,然后才能将其联系成一般理论”。^②

另一位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者利厄柏·罗伯特(Lieber Robert)同样认为,国际关系中虽然没有一般理论分析,但是“这一特殊学科具有探讨特殊主题的理论群体的长处”。他解释说,目前虽然没有任何一种方法能主导这个研究领域,但是却能在整体上减少现实受到歪曲的可能,并且有助于创造可信的知识和明确政策选择及其方法,拥有一系列的颇有潜力的技术和理论。^③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明确地认为,从国际关系研究的现状来看,其理论构建的任务不是发现涵盖一切的一般真理,而是在已有的一般理论指导下,通过对国际社会种种现象的考察,找出在本学科内具有说服力的中层理论和个别理论假说。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国际关系理论的新成员,更应如此。

三 国际关系中政治经济互动机制的三种观点

应当承认,国际政治经济学还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即使在西方学术界也鲜有人称国际政治经济学已达到了成熟的阶段。在中国,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也基本上处于起步阶段,尚未形成自己独特的学科理论体系。

任何一座大厦的建设都离不开一个清晰的、完整的构建蓝图。国际政治经济学这座学科大厦的建设也不例外。什么是国际政治经济学?它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国际关系中的政治和经济又是如何互动的?这些正是绘制这张建设蓝图中三个重点要解决的问题。其中,对国际关系中的政治经济互动机制的研究又是其中的根本理论建设。

在这个问题上,西方学术界已经做出了许多积极的探索。以基欧汉和奈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相互依存理论、以吉尔平为代表的新现实主义霸权稳定论以及以多斯桑托斯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依附论,分别从不同角度对国际关系中政治与经济互动的具体表现形式及其路径、机制,提出了较有说服力的理论假设。

不对称性相互依存是国际政治权力的源泉,这是

以基欧汉和奈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相互依存理论的重要观点,是复合相互依存理论关于国际关系中政治经济互动关系的理论精髓。基欧汉和奈认为,在现有的国际关系之中,均衡即完全对称的相互依存是很少的,绝大多数国家处于不对称的相互依存关系之中。衡量是否对称的关键在于敏感性和脆弱性两个概念。简单地说,敏感性是一国对他国政策变化做出反应的速度快慢;脆弱性是一国因他国政策变化而做出反应时付出的代价大小。在敏感性和脆弱性方面占上风的国家因此获得了影响和强制他国去做其所不愿意做事情的权利。在这里,国际关系中的政治与经济互动机制被揭示得十分清楚:经济上不对称相互依存→优势国家利用敏感性和脆弱性上的差异来迫使劣势国家屈从自己的意志→不平等的国际政治格局。以相互依存为基础分析国际政治的权力分配,从另一个视角解释了国际政治经济互动的动力。

吉尔平的霸权稳定论则是运用经济学中公共产品概念和边际成本收益分析来论证“有霸则稳,无霸则乱”的强权哲学。吉尔平认为,国际体系能否稳定取决于是否有一个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技术上处于压倒优势的国家为国际社会提供稳定的货币体系、开放的贸易体系和可靠的安全体系等国际公共产品。谁能提供,谁就是霸主,谁就能形成“××治下的和平”。历史上“英国治下的和平”和战后初期“美国治下的和平”就是这么一回事。但是,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所导致的边际成本递增与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决定了霸主自我消耗和霸权必衰的结局。因为霸主国之所以愿意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是为了建立一个按自己意志运行的国际体系,从而达到本国政治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但是在边际成本递增、边际收益递减的经济规律作用下,霸权国家原有的压倒一切的政治经济和技术优势被逐步耗散掉,最终因陷入入不敷出的困境而不得不败给新兴的挑战者。于是新霸权在对旧霸权的战争中登场。以吉尔平为代表的新现实主义的政治经济观也是十分清楚的。其逻辑思维是:霸权国家压倒一切的政治经济

① 刘小林主编:《冷战后国际关系理论的变化与发展》,第10页

② [日]星野昭吉编著,刘小林、王乐理等译:《变动中的世界政治》,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85页。

③ Lieber J. Robert, *Theory and World Politics*,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73, pp.162 - 163. 转引自[日]星野昭吉编著《变动中的世界政治》,第88页。

优势→提供国际公共产品→霸权体系得以建立→边际成本递增、边际收益递减→霸主国国力耗散→霸权式微→新的争霸战争→新霸权体系形成。

由于霸权稳定论具有在政治上为二战后美国霸权政策进行辩护的嫌疑,因而它遭到了广泛而持久的批判。邓肯·苏维达尔和布鲁斯·拉塞特认为,吉尔平所谓的国际公共产品实质上是霸主国维持霸权所需的私有商品。国际公共物品是一种虚拟的存在,是霸权国家为了追求自己利益而恣意玩弄的、毫无公共性的工具而已。^① 尽管有这样那样的批评,霸权稳定论者研究问题的独特思路却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依附论与战后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有密切联系。尽管依附论者大量使用阶级、剥削、社会主义革命等词语,但其理论思维又与新马克思主义不完全一致,而且研究对象只局限于不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依附论者有的比较激进,有的比较温和,也有的相当“改良”。他们的共同点是研究不发达国家为什么贫穷以及通过何种政治手段来摆脱贫穷。依附论者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相互关系的观点有两个倾向:一是以安德烈·冈得·弗兰克、萨米尔·阿明等人为代表的激进派。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贫穷不仅是历史上的殖民主义造成的,而且还由于国际经济中的不平等的交换使外围国家即发展中国家的财富源源不断流向中心国家即欧美发达国家。他们开出的药方是与资本主义脱钩,退出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以斩断发达国家剥削压迫发展中国家的途径。二是以多斯桑托斯为代表的正统依附论者则要冷静一些。他们突破了激进派外因论的片面之处,进而认为不平等交换一方面使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市场体系中的贸易条件恶化,另一方面造成了在发展中国家掌权的买办阶级与发达国家统治者联手共同压迫剥削本国人民。多斯桑托斯主张,改变发展中国家贫困的根本出路在于发展中国家的工人、农民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打倒买办阶级,即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来改变受国际不平等交换之苦。

此外,以卡尔多索为代表的改良派在承认不平等交换给发展中国家带来苦难的同时,主张利用资本主义市场,实行出口导向战略来谋求实现从依附性发展向自主性发展的转变。

可以认为,不平等交换是依附论三大派别的共同理论基点。所谓不平等交换不只是国际市场上的工业品和农业品、高技术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之间的不

合理价格体系,更主要是体现在因资本和技术可以跨国自由流动而劳动力却不能自由流动所造成的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劳动价值的无偿或低价占有。如果对依附论的主流所主张的南北关系中的政治经济互动机制做简单概括的话,可以如此表述:国际不平等交换→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加剧→与发达国家决裂或爆发国内社会革命。

现阶段的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是在经济全球化进展迅猛和国内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大背景下展开的。西方学术界的优秀成果都将成为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外来营养。中国的学术界只有通过同外部的不断交流才会有思想碰撞的火花,才会有对已有成果的重新审视,才会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学术成果。上述的相互依存论者、霸权稳定论者和依附论者对国际关系中政治经济互动机制的表述虽然有失偏颇,其理论说服力也各有差异,但是他们所创造的理论概念、所使用的理论分析工具不能不使我们敬佩。在相互依存论者看来,国际关系中的政治经济互动的核心在于脆弱性和敏感性之中,不对称的相互依存关系所形成的脆弱性和敏感性的差异构成了国际政治权力的基础。在霸权稳定论者看来,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中的边际成本收益分析是国际政治军事霸权必衰的内在规律。尽管依附论者的政治主张多样,有的主张与资本主义脱钩,有的主张社会主义革命,有的主张韬光养晦,但他们的政治主张都是建立在国际不平等交换的理论基础之上的,国际不平等交换的实质在于劳动力的不可自由流动性。在他们的著述中,尽管没有正面去叙述政治与经济的相互关系,但是通过对敏感性和脆弱性描述,国际公共产品的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分析以及对国际不平等交换等国际关系中普遍存在的现象的具体考察与深入分析,从而在国际经济和国际政治之间架起了一座互通的桥梁。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构建就是要在西方已有的学术成果基础上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进一步深化和批判,去伪存真,去粗取精,从而提出更有说服力的理论假说。只有这样,才能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建立起一个又一个“中层理论”,以便将来的某一天建立起一个具有普遍解释力的“一般理论”。

^① Duncan Suddal, "The Limits of 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39, No.1 Spring 1985.

四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方向

我国国际关系理论学者倪世雄在《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与流派》一书中介绍了西方学术界的一个流行的说法。书中写道：“现在要成为一个国际关系学者，就要求首先是一位 IP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ics 英文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简称) 学者。”^①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大行其时，一方面令人为其学术生命有如此巨大的潜在能力而欢欣鼓舞；另一方面又促使人们冷静地思考这门学科的发展方向。直截了当地说，对国际关系中政治经济互动机制探索的成功与否，是同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紧密相联的。

在研究对象上，国内学术界看法有很大的区别，有的人强调的是各个行为主体之间政治经济互动的一般形式和规律。《国际政治经济学概论》一书指出所谓行为主体是指主权国家和国际组织、跨国公司、跨国银行、跨国政党等。正是这些行为主体的对外政治经济行为构成了国际政治经济的基本内容，彼此间的相互作用及其结构形态构成了世界政治经济体系或“秩序”。因此，“国际行为主体是国际政治经济学基本单位，也是我们进行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客体和基本的逻辑起点。”^②另外一本国际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国际政治经济学》则明白无误地表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国家、跨国公司和国际组织的地位、作用与相互影响。^③笔者引用美国学者金德尔伯格关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观点，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应集中在以下七大问题：(1) 对国际范围内政治与经济互动的基本原理的探索；(2) 对当代资本主义现状和发展趋势的研究；(3) 对当代国际秩序的研究；(4) 对不发展问题原因及其出路的研究；(5) 对国际组织和国际政治经济合作的研究；(6) 对国际货币体系、贸易和投资、经济援助与技术转让等重要国际经济问题的研究；(7) 对各国外交政策中经济政策的研究。^④

由上可见，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者在论及研究对象时，实际上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倾向于从研究客体的角度来确定研究对象；二是从研究内容的角度来确定研究对象。实际上，在国际学术界中，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尚未有统一说法。例如，被视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创始人的罗伯特·吉尔平和苏珊·斯特

兰奇对此就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吉尔平是以二战后国际经济体制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他在其集大成之作——《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中分门别类地对二战后国际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做了理论上的阐发和分析，包括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主体的国际金融体系、以关贸总协定为主体的国际贸易体系和以发展模式、债务危机等为主要内容的南北关系等等。然而，斯特兰奇却另辟蹊径，提出了结构性权力的概念，并衍生出安全结构、生产结构、金融结构和知识结构四种权力以及运输结构、能源结构等次要权力结构。其分歧之大，远过于中国学者之间的分歧。

但是，从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学者的总体状况来看，把国际经济体制尤其是二战后国际经济体制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力图探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所代表的国际经济体制内所包含着的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相互作用的奥秘占大多数。

罗伯特·吉尔平说得好，他所倡导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自始至终地贯穿着一种努力，即“为必然要出现的国际经济秩序和国际政治秩序描绘蓝图”。^⑤冷战的结束和全球化的到来，给我们提出了一系列重要问题，其中主要有：(1) 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的发展趋势是什么？是多极化还是美国的单边主义？(2) 冷战结束的原因是什么？是西方的价值观念战胜了以前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还是其他原因？(3) 全球化究竟给不同类型的国家带来什么影响和机遇？在以科技为主体的综合国力竞赛中发展壮大的战略和战术是什么？(4) 在全球化日益进展的情况下，需不需要以及应该如何去争取建立新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推进彼此关系的发展？等等。就中国的改革开放方针和对外战略来看，也迫切需要我们z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研究新问题，提供新思路。

邓小平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提出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两大主题的命题。从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

① 倪世雄等：《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与流派》，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年版，第 348 页。

② 宋新宁、陈岳：《国际政治经济学概论》，第 9 页。

③ 彭澎：《国际政治经济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年版，第 6 页。

④ 樊勇明主编：《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与流派》，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第 6 页。

⑤ [美] 罗伯特·吉尔平著，杨宇光等译：《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第 10 页。

的互动角度去深入探讨和平与发展两大时代主题是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具体而言,以下课题迫切需要我们做出理论回答:(1)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程中,对中国外交提出什么新要求?对亚洲太平洋地区乃至国际社会产生什么影响?(2)全球化对中国国内的改革开放有何影响,中国在以综合国力为主体的国际竞争中应采取的战略方针是什么?(3)如何为中国实行至今的以领土和主权不可侵犯为核心内容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注入新的内容?(4)中国作为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最有影响力的第三世界国家,如何去参加和推动争取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斗争,为改善南北关系而努力?(5)中国一方面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另一方面又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较低的国家,如何从政治经济综合角度去评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发挥应有的影响?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国际政治经济学是国际关系研究的新增长点,是最有发展前景的学科。之所以这样讲,不仅仅因为它是 20 世纪 70 年代才兴起的新学科,更重要的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符合社会科学“最适合课题”的三大条件:

第一,作为一个合适的课题,必须是代表本学科发展中一些带有全局性意义的特征。研究它,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在探索本学科发展的关键部分。目前,整个国际社会正处于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之中,这必然影响国际政治的发展变化。而国际政治经济学正是从政治与经济相结合的角度来研究国际关系。这不能不说国际政治经济学代表了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方向,抓住了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互动关系的研究就是抓住了时代的本质,把握住了国际关系学发展的方向。

第二,作为一个合适的课题,其理论研究应是属于整个学科或相关学科理论内研究中薄弱的环节。受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对经济问题政治化、政治问题经济化的表象描述已经满足不了日益增长的国际交往的需求。现实生活呼唤着理论创新,推动着人们去揭开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互动之谜。国际关系研究应该对国际社会政治与经济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表现形式、途径以及内在机制进行规范、科学和简约的理论抽象。例如,1997 年发生的东南亚金融危机,虽然不见硝烟、不动枪炮,但造成的损失却比二战以来任何一场热战都要惨重,东南亚国家几十年来的辛苦和血汗在一夜之间付诸东流。现有的权力政治和安全保障理论已经对此无法做出说明。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国际关系研究应该进行理论回应。可以说,诸如此类的研究就是参加了对国际关系理论的薄弱环节的攻关。

第三,作为一个合适的课题,研究对象应该是具有一定发展潜力的,且其潜在影响正在逐步发挥。研究它不仅清楚地解释已经发生的历史,而且能分析、预测和判断今后学科发展的基本方向。冷战结束后世界局势走向多极化,国际竞争从军备竞赛转向综合国力竞争。无论是苏联解体,还是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以及伊拉克战争,都从不同侧面证实了历史潮流的转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国际政治经济学是国际关系中最有发展潜力的学问,是一座有待开采的“富矿”。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建设任重而道远。

[收稿日期:2004-12-15]

[修回日期:2005-01-14]

[责任编辑:谭秀英]

· 学术动态 ·

“国际关系理论非主流学派研讨会” 将于 4 月在京召开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政治研究室和《世界经济与政治》编辑部将于 2005 年 4 月中旬在北京召开“国际关系理论非主流学派研讨会”。会议内容包括四个专题:英国学派、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批判理论和后现代主义。会议已邀请有关专家撰写论文与专题报告。

border conflict.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border conflict evolved into a border war. There was imminent danger of military confrontation along the Sino - Soviet border. Although both sides took conciliatory steps, they eventually became entrapped in a long - term state of approaching war. History has shown that the proper way of dealing with border conflicts is to negotiate based on acknowledgement of the status quo; an effective mechanism should be established to cope with the crisis instead of relying on experience and convention. Although we affirm the success of China since liberation in preventing the escalation of crises, some lessons should be drawn from these experiences.

Case Study of China's Management during the Embassy Bombing Crisis

Wu Baiyi(22)

The U.S. bombing of the Chinese Embassy in Belgrade on May 8, 1999 triggered an unprecedented diplomatic crisi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Consequently, the crisis severely affected China's policy - making environment, its U.S. policy, and public opinion. This essay presents a case study of Chinese management throughout the entire period of the crisis. By apply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crisis management, the essay attempts to determine both the merits and shortcomings of the Chinese management regime and its capabilities.

The Sino - American Aircraft Collision and its Lessons

Zhang Tuosheng(30)

In April 2001 the collision of Chinese and U.S. military aircraft soon triggered a crisi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With concerted effort, the crisis was brought under control and resolved. The incident caused serious damage to Sino - U.S. relations, but it also accelerated the process of mutual understanding. A summary of the lessons from this experi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risis managemen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future Sino - American relations.

Exploration into the Interactive Political Economy Mechan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an Yongming(37)

An exploration of the interactive political economy mechan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s a historical miss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While adhering to basic Marxist opinions about political economy interactions, we should also draw on Western academia. Neo - liberalist interdependence theory represented by Robert O. Keohane and Joseph S. Nye, neo - realist hegemony stability theory represented by Robert Gilpin, and neo - Marxist dependence theory represented by Theotonio Dos Santos have all, in different ways, put forward convincing theoretical propositions about the

concrete form, route, and mechanism for political economy interaction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se theories are worth serious study and referenc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and Comparative Political Economy

Zhu Tianbiao(44)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IPE) and comparative political economy (CPE) are two relatively new Western academic fields that arose in the late 1970s. While IPE has already fully developed, CPE is still in the process of formation. By offering a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wo fields in the West, especially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author clarifies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fields, especially between the two terms,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that mark the key difference between IPE and CPE.

Legitimacy and the Decline of Hegemony

Zhou Piqi(50)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reasons for the downfall of hegemon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irst, it criticizes current theories on the collapse of hegemony and points out that the decline of material strength and the waning of domina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are the reasons for the downfall of hegemony; there are contradictions between the assumption of state reason and the cause for the downfall. The decline of hegemony does not necessarily lead to war. Based on this criticism, the paper revises the reasons for the downfall of hegemony, pointing out the real reason is the legitimacy crisis of hegemony. The logical process in the downfall of hegemony is: legitimacy crisis, maintenance of hegemony by way of power, increases in the costs of maintaining the hegemony, exhaustion of power, and downfall of hegemony. Therefore, a countermeasure to stop the downfall of hegemony is to make the utmost effort to maintain its legitimacy.

The Influence of the EU in the Democratization Process in Turkey

[Turkey] **Zuhal Yesilyurt Gündüz**(56)

Turkey is a special European country in that both democracy and autocracy have played very important historical roles. Turkey has been striving for many years to become a member of the EU. To achieve this goal, it has undertaken reforms based on EU standards. The EU has proposed very strict and even harsh requirements. The major requirement is the demand that Turkey eliminates the influence of military troops in national political life and realizes political democratization and rule of law, including respect for human rights, freedom of speech, the lifting of the death penalty, and prohibitions against abuse and torture, among others. During the process of political democratization, Turkey has made great